

## 一、前言

辛亥革命在陝甘

第七期 乙巳國十九年二月  
（一九四〇）  
全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張力

有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學者甚感興趣的題目；因為此一革命行動的爆發，不僅結束了滿清政府一六八年的統治，也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帝制政體。此外，民國以來的政局發展，幾乎都與辛亥革命的發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就廣義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來看，學者自然不會只侷限於辛亥當年的革命行動；是故一般所謂之辛亥革命歷史，主要部分還是在一九一一年以前，革命醞釀期間的種種問題探討。因此有關清末政局演變，立憲派的角色，革命黨的人物、組織與行動，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都會受到學者的注意，且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辛亥武昌起義能在短短幾個月期間，陸續獲得各省響應，終於迫使清帝退位，就是因為多數省區早已有革命黨人的苦心經營，掌握了主要階層的力量，因而能在時機成熟時，迅速予以動員。由於各省之情況不同，其革命活動的表現也各有各自特色。本文以僻處西北地區的陝西省和甘肅省為探討對象，觀察此兩省在清末如何應變，革命力量如何萌芽成長，以及武昌起義爆發後，兩省官紳所持的態度及響應的情形。結論之中將探究陝甘之辛亥革命，對於民國成立後此一地區政局之發展，所可能造成之影響。

## 一、清末陝甘的變局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勢力大舉侵入中國；清廷在國勢衰微之際，窮於應付外患。幾次禦侮戰爭多告失敗，清廷不免割地賠款，且喪失若干利權，但中國也在此時開始領悟到西方所帶來的軍事、經濟、文化的衝擊。一般而言，沿海省份分得地利之便，易於接觸外人，也就益發容易感受到外力的刺激，如有開明的官紳刻意講求，則其民智得以較早

獲得啓發。內陸省分往往因地處偏僻，對於世局的變化，不易產生深刻的感受。

清廷初時對於外力的肆應，表現在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方面。同光年間，沿江沿海地區創辦了不少以軍事建設為主的新興事業。而於此同時，西北地區捻、回變亂，漸有蔓延之勢；清廷遂調閩浙總督左宗棠前往西北平亂。由於左氏曾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籌設馬尾船廠，對於西洋新事務頗有一番認識。因此在到達西北平亂時，先在西安設立機器局，製造新式槍炮所需的彈藥。隨著軍隊西進，西安機器局遷往蘭州，改名蘭州製造局。亂事平定後，左氏感於「隴中寒苦荒儉，地方數千里，不及東南一富郡」，（註一）而「西北之利，畜牧為大，而牧利又以羊為長，其毛可織，其皮可裘，肉可為糧，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而後致富？」（註二）便開始籌設蘭州織呢局，遠從德國購買機器，聘請洋員，意圖在自強運動聲中，發展西北地區的新式毛織工業，為當地開闢利源。然而此一新辦工業僅存在三年，左宗棠調離陝甘總督不久，即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宣佈裁撤。

自強運動時期西北地區唯一具有代表性的事業僅如曇花一現，對於當地並未帶來甚大衝擊，倒是後人屢次想以織呢局的基礎，再圖發展毛織工業。而在追求船堅砲利為目標的自強運動時期，朝野少數知識分子已逐漸體察時勢的變化，必須廣為開通民智，方能肆應變局。是故在甲午戰前，國內已有少數知識分子深感自強運動不足以救中國，遂紛紛設立學會，創辦報刊，傳授新知識，展開了蓬勃的開民智運動。

陝西省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五）即有西學的傳授，是年候選同知舉人柏子俊與咸陽舉人劉光蕡主講於涇陽味經書院，於院內立求友齋，以天文、地輿、經史、掌故、理學、算學課士，並刻「梅氏籌算」及「平三角舉要」，同時又築通儒臺，以實地測驗。劉光蕡本為陝西關中之經學家領袖，治西漢之今文之學，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資治通鑑），但他卻「知時局將更，故於天算輿圖中外交涉，靡不研究。」（註三）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又立時務齋，大力介紹西學。（註四）他主講味經書院十四年後，赴甘肅蘭山書院，但只任職年餘即歿，遂無法對甘肅新式教育的建立發揮影響力。

清末陝省新式教育發軔於傳統書院中，甲午之後，戊戌之前，開民智運動蔚為風潮，就陝甘兩省而言，甘省對於新

知的接觸，遠遜於陝省。僅知甘省於陶模擔任陝甘總督期間（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因時局多艱，飭各營旗練習新操，課士亦改成策論，由湖北、上海購置中西圖籍數百種，分儲蘭山、求古、隴南、河西各書院，俾士子講求實學。」<sup>（註五）</sup>而在陝西省內，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陝省舉人邢廷英、成安，生員孫灤海、張象詠鑒於書院學子平日所習者「經史之外，制藝詩賦而已。明體而不能達用，考古或未必精通。」遂聯名請求自籌款項，創建格致書院，「延聘名師，廣購古今致用之書，分門研習，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學西學，但期有裨實用，如天文、地輿、吏治、兵法、格致、製造等類。」<sup>（註六）</sup>護理陝撫張汝梅和學政趙維熙據此奏請設立。翌年易名為崇實書院，課程注重格致、英文、算術、製造。中分政事、工藝二齋，即淵源於味經書院的時務齋。這所書院的創建，直接刺激了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立即展開對於湖南省書院的改革措施。<sup>（註七）</sup>此外新任陝撫魏光叢亦於光緒二十二年據陝督糧道姚協贊據舉人薛信等稟奏，於西安之崇化書院試辦游藝學塾。<sup>（註八）</sup>由姚協贊任總辦，課程分算學、格致、英文、課外閱讀等。學生約七、八十人。<sup>（註九）</sup>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各省奉旨創辦中學堂，陝西巡撫端方會同督學趙維熙開辦中學堂於北院內，游藝學塾亦歸併其中。講授史地、算學、格致等課程，學生六百餘人。戊戌政變爆發後，新創設的中學堂旋告中輒。<sup>（註十）</sup>

教育內容的漸次更新，使得年輕土子有機會接觸新思想，成為日後推動立憲和革命運動的主要人物。甲午之後，陝甘兩省均若干知識分子，在逐漸興起的維新運動中，同樣表達了對於國是的關懷，由康有為、梁啟超所倡議的「公車上書」，就有五十位陝籍舉人、六十一位甘籍舉人簽名響應。此外另有七十六名甘肅舉人聯名寫了「請廢『馬關條約』呈文」，準備送交都察院請求代為呈遞。後因「馬關條約」已獲清廷批准，情勢無法挽回，呈文只好擱置。<sup>（註十一）</sup>甲午之後，新式教育的推廣日漸受到重視之外，各地也紛紛成立學會或學社，一則結合同道，另則啓迪民智。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冬，陝籍土紳李岳端（咸陽，光緒九年進士）、宋伯魯（醴泉，光緒十二年進士）、閻迺竹開京師關西學會，次年正月成立。這個學會的成員原則上以陝籍同鄉為主，不過「他鄉魁儒傑士，願入會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攬。」學會主旨在治經義：「以經術言變法，為本原中之本原，當發明聖制，探討微言，勿尚瑣碎支離之漢學，勿驚擾。」

空談無根之宋學。」治國聞：「西歐民政，東瀛會社，皆彼中立國之本，賢者識小，尤當全力赴之。文字語言，格致測算，精力兼人者宜各占一科。」會員每週聚會一次，就所讀之書互相討論質疑。並希望藉此協會「起點京師，鳩聯桑梓，置郵傳命，必有應者。」（註十二）

關西學會又稱為「陝學會」、「關學會」，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三月擴充為保國會，成為繼強學會以後在京師最活躍的學社。保國會之成立在於喚醒國人，應付外禍，組成分子以各省公車為主，大多為康有為所羅致之人，來自中國十七省區，另有少數滿人，共一百八十五人，其中陝籍人士最多，有三十四人，佔全體成員之十八·四%。甘籍亦有六人。保國會成立時間不長，嗣後因守舊勢力不斷攻擊，而告停止活動。（註十三）從清末陝西之推動立憲來看，保國會之陝籍人士與省內活動並無關連。後來成立的陝省諮詢局，議員之中未曾有加入保國會者。維新時期在京師論列新政極為活躍的宋伯魯，因戊戌政變而亡命，終於被捕，旋伊犁將軍長庚邀之入幕。長庚返京師後，又去職，直到民初才又踏入政壇，當選為參議員。（註十四）大體而言，陝甘兩省士紳，並未積極參與省內的立憲運動，對辛亥革命也持消極的態度。（註十五）旅京的陝籍知識分子早期雖曾活躍一時，然戊戌以後，也銷聲匿跡。

一九〇〇年的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進攻中國，平津一帶慘遭戰火蹂躪。這場戰爭雖未波及其它省分，但對中國各方面的影響至大。戰爭結束後中國與列強所訂之辛丑條約，不僅強迫京城門戶洞開，造成國家主權和國民心理的極大傷害，而所應賠償的損失亦超過以往任何和約。陝甘兩省也需各自籌六十萬兩和三十萬兩的賠款，這個數目比起他省雖不算多，卻也使財政本已拮据的陝甘兩省增加不少負擔。（註十六）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倉促出京，經熱河抵山西太原，並準備西幸長安。此時兩江總督張之洞等江南督撫上電勸阻，力言不應有遷都之心，且「陝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來，屢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邦。又與新疆甘肅為鄰，近逼強俄。甘肅尤為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註十七）然慈禧等人仍於一九〇〇年十月進入陝西，十一月進駐西安，直至翌年九月，方才回京。此次兩宮倉惶出奔陝西，對當地一般民眾之生活有如下之體認：

太后未到行在之先，謂王中堂曰：我要看看百姓究竟是如何苦，是以太后御車行至鄉間，百姓皆得見天顏。並有

註十八

鄉農遠立田間翹望，並不趨避，太后並不加罪。皇上看見鄉民形狀，甚奇之，蓋從未見過者。太后謂皇上曰：「咱們那裡知道百姓如此困苦！」故到行在後，即命岑中丞辦賑濟，開粥廠，並時以賑務如何詢問岑中丞不置。」

雖然如此，慈禧留居西安期間，自己的生活依然揮霍如故；不過她之下罪己詔，保舉人才詔，進而宣佈變法，也是事實。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慈禧命內外大臣督撫條陳改革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兵政。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再以光緒名義正式頒布變法詔。雖然論者批評慈禧變法之舉，只是應付外人，並無改革誠意。（註十九）但是朝廷廣開言路，對大臣之改革意見一一採納，以收拾民心。對於開民智運動所倡行的興辦學校，成立學會、發行刊物等事，均開放不禁；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在此由上而下的改革聲中重新活躍。（註二十）因此這次變法可以看作是中樞有意作全面改革的發端。

下面所錄陝西安塞縣民郭超群所撰之「敬告同鄉父老興學書」可為代表：

外人屢次侵華，竟至演成庚子之禍，方使朝廷產生痛定思痛的感受與作為；而對陝甘之尋常百姓亦造成若干刺激，同嗚呼！時至今日痛不堪言矣，一變而爲甲午，再變而爲庚子，含垢忍辱莫可爲甚。吾等同此圓顧，同此方趾，同此戴天履地，同此肺腹衷腸。嗚呼！諸父伯兄諒共知之矣，何忍宴安鳥鳩毒而甘心爲人奴隸者哉……因此他勸告鄉人響應政府之新政措施，早日辦理學堂，鼓勵子弟接受新式教育，甚至出洋留學。（註二一）類此民間言論，在陝甘其它地區應不難發現。由此可見，外力侵略之刺激，確曾帶給陝甘部份人民求新求變的想法。

庚子之後，清廷改弦更張，試行新政，並預備立憲。陝甘兩省督撫大都按照清廷旨意，逐步實施。陝西省無論在設立新式學堂、籌設諮詢局，以及推行農工商務，均表現得中規中矩。甘肅省卻因陝甘總督升允思想保守，新政推行甚爲緩慢。升允爲蒙古鑲黃旗人，自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起先撫陝三年，嗣後任陝甘總督四年，在陝甘地區擔任行政首長達七年半之久。方其撫陝時，尚能奉行命令，逐一展開新政措施；但調升陝甘總督後，卻對清廷預備立憲的指示和籌設諮詢局的工作，屢次延宕，引起清廷的不滿。升允自認「賦行迂拘，素以不喜新政見譏於時。」但任職甘督四載，

「如提倡農業，振興商務，講求開礦，敦勸考工以及法政等項學堂，凡於大體無傷者，未嘗不人云亦云，應有儘有。」他對立憲甚感疑惑；而且相信代議政治有害無利。依升允的看法，「國會不難於召集，而難於解散……議者曰伸民權，夫民權無由伸矣，所伸者乃生旁鑑之權耳。」所以他主張預備立憲「九年之期限不特不可縮短，即至九年後，尚須體察情勢再飭施行。」升允這種想法，自然違背了當時的潮流。尤其升允對財政、學務、軍政、刑律四方面的意見，更可看出他的保守性；他擔心各省議員藉機抗稅，危害政府財政；又認為「通西學者不過能充繙譯買辦，精格致者不過可為藝工之師，其邪僻而無長者，乃至勾結匪徒倡言無忌。」軍政方面，他以為新軍「亦僅衣帽步伐整齊可觀，居平衛生潔淨自喜，此兵家之所忌。」刑律方面，他則反對改變傳統的審判和刑罰。（註二一）升允自知他的想法必遭清廷之忌，所以稱病請求開缺。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五月六日上諭就指責升允「跡近負氣，殊屬非是，本應予以嚴懲，姑念該督久任封圻，尚無大過，著照所請，即行開缺。」（註二二）升允之後護理甘督的毛慶蕃也因督辦新政不力，而遭革職；似升允和毛慶蕃之例，在清末也是僅見。（註二三）

清末數十年間，清廷內部開明與保守勢力相互頽抗，保守派大都處於上風；直到最後十年，清廷才被迫面對現實，推動新政。然而此時海外的革命組織已如雨後春筍般建立，並進一步地整合為同盟會，清廷此時已是強弩之末了。

## 二、革命勢力的興起

對於革命運動的參與，陝人顯較甘人積極。就革命黨人而言，甘省或曾有人加入同盟會，但人數較陝省相去甚遠。（註二五）清末海外組成的各種鼓吹革命思想的組織中，甘省僅有一由黃鍊、順文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成立的大同盟會，藉以連絡志士。（註二六）陝西省內的革命勢力與國內其他各省比較，雖然出現較遲，卻能在武昌起義後隨即響應，並且帶動了甘肅走向共和。

陝省最早表現出革命思想者，當推二原于右任。根據其「牧羊兒自述」，于氏早在幼年時就已有「民族意識的憧憬」。而在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慈禧太后為避庚子之變入陝，于右任即上書陝撫岑春煊，請其手刃慈禧，但為同學

王炳靈所阻。此後于氏的民族思想日益高漲，不時批評時政，並刊行「半哭半笑樓詩集」，公開指責清廷和權貴的昏庸無能，力主革命救亡。陝甘總督升允以「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語，密奏清廷，時于右任赴河南開封應試，險遭逮捕。旋逕赴上海，識馬相伯。一九〇六年赴日本加入同盟會。返國後連續創辦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鼓吹革命。（註二七）不過于右任長居上海，其言論關注的是革命運動的整體，在陝省境內推動革命者則另有他人。陝西省內的革命勢力約略有三，一為同盟會員，一為黨份子，三為新軍。然三者並無截然之劃分，亦有少數人兼具兩種或三種身分者。

中國革命同盟會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會員多為各省官私費留日學生。當時陝甘亦有留學生在日本同盟會者，還有三原縣之潘國章，蒲城縣之井勿幕，及三原于右任。（註一九）一九〇五年秋，井勿幕奉中山先生命返回陝西進行宣傳與組織任務，陸續吸收三十餘人加入同盟會陝西支部，井氏任支部長。一九〇六年春陝西支部在三原召開一次全體會員會議，井勿幕提出聯合給會黨、刀客等反清力量，迅速擴大同盟會等意見。但因同盟會員多係讀書人，對會黨持有限制意見，並未接受井氏意見。會後井勿幕帶領同盟會員鄒子良、王守身等人赴宜君、黃陵等地勘察地形，籌備建立根據地。同年夏，井勿幕再去日本，陝西方面的工作由李仲特、焦子靜負擔。（註三〇）

井勿幕重返日本後，陝西留日學生已較前增多。因陝西省選送之首批留學生，一是來自西安的高等學堂和優級師範學堂，一是來自三原宏道學堂，隱然分成兩派。井勿幕為打破彼此藩籬，並吸收革命同志，遂與趙世鈺等組同盟會陝西分會，陸續入會者有三十人，並選出白秋陔為首任會長，其後又由楊明源、趙世鈺續任。（註三一）陝西分會成立後，開始進行如下步驟：（1）組織輿論機關，（2）連絡內地高等師範各學生；（3）倡辦新興之各種會所，如省教育會、商會，先後發諸言論。陝西留日學生與甘肅留日學生創辦「秦隴」，由黨積齡任總經理，鄭朝俊、馬步雲、張蔚森分任事務、會計和印刷等職；張孝慈、楊思為總編輯。後因組織不健全及編務問題，出刊一期即告停刊。同盟會陝西分會逐另組「夏聲」雜誌，除由全體會員參加外，並廣泛吸收同情革命的進步人士參加，撰稿人計有李元鼎、茹欲立、曹澍、

張熾章、李述膺、張秉鈞、姚金振、陳之碩、徐應庚、張贊元、張翔麟、李壽熙、景志傳、張靖、李魯吾等十餘人。另有部分陝西學生如譚煥章、崔雲松、鄒朝俊等後與甘肅學生結合，利用「秦隴」原來的基礎，出版「關隴」雜誌，「夏聲」與「關隴」雖各自爲政，隱然形成對峙之局，但對新文化的介紹和輿論的鼓動上，實收相得益彰的效果。不過「關隴」出版未久，也告停刊。（註二二）

光緒二十四年（一九〇八），陝西境內的同盟會員已經建立若干據點，進行宣傳革命的工作。焦子靜、張拜雲等，合資在西安開設公益書局，並附設印字館兼營印刷。書局除銷售一般有關新文化的讀物外，更銷售東京及上海出版的宣傳革命書刊，如「民報」、「夏聲」、「關隴」、「鐵拳」等雜誌，以及其他革命黨人的著作。西安爲陝西省城，公益書局在焦子靜等人主持下，成爲此一善之區重要的傳佈新思想的機構。省城和省內其他州縣的同盟會員，經常來此聚會，連絡感情，並交換意見。透過此一機構，同盟會團結了不少陝西的開明士紳。公益書局本身亦附設公益印書館，可供印刷刊物之用。同年，張拜雲、焦子靜、吳寶三等地方士紳因爭西潼鐵路改歸商辦不得，深感非推翻滿清政府不足救國，乃從文化運動著手，並聯合焦子靜、王子端等數十人又在西安之富平會館創辦了健本學堂，最初由王偉齋任管理員，後由王子端續任。（註二三）健本學堂名義上爲一高等小學堂，實際上爲一培養年輕革命同志的機構，任課教員多屬義務職，不支薪給。該地也是同盟會會員彼此連絡的重要據點。學堂教員和來此的黨人常有機會向學生灌輸新的思想。學生之中，如胡景翼、尚武、焦援、賈紹、閔孝騫、紀從今、景崇文、楊瑞軒、焦拯等，都於日後從事革命工作。學堂西偏院是一練武場，胡景翼甚至借練武場爲名，不時聚集新軍中思想進步的人，接頭連繫，相機進行活動。（註二四）

清末的革命活動與海內外會黨早有關係，如孫中山、黃興等就會聯合過洪門、三點會、致公堂等團體。井勿幕鑒於此，於一九〇五年初次返陝進行革命宣傳時，即有意連絡陝省的會黨與刀客。因當時遭其他會員反對，遂罷此議。不過井勿幕不久由高又朋介紹與「慕親會」的僧人吳虛白見面，進而與其領導人洪寶臣、唐和尚建立私交。一九〇八年十月井勿幕奉命再度返陝，籌組同盟會陝西分會。井氏與陝省各地同盟會員連絡後，由各同志選出李仲特爲會長，同時議決：聯合新軍、慕親會、哥老會等力量，推動革命，以與全國情勢相配合。（註二五）井本人加入西安哥老會，聯合其首

領張雲山、馬玉貴、陳德貴等人，籌備佔領潼關，出師河南。又與宋元凱、胡景翼等，和刀客首領王守身、田玉潔交往，得其徒衆六千餘人，爲陝省唯一的革命武力。（註三六）同盟會與諸會黨共同擬出一名義叫「同盟堂」，編定「通統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四句隱語。同盟會曾在西安大雁塔召集一次會議，決定一九〇八年重陽節祭掃黃帝陵墓，是日仿「慕親會」供奉佛祖達摩的儀式進行，到者除陝省會員十六人，另有鄰省在陝會員四川七人、甘肅、山西各二三人，廣東一人，共二十餘人。此後哥老會所使用的一些隱語，也逐漸爲同盟會採用，作爲相互連絡的暗號。（註三七）新軍是清末革命黨人主要爭取的對象。陝省新軍是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春，由原有的常備軍隊擴編爲步兵兩標兵科的學生分別派充，士兵由關中各縣按規定標準徵來。陝省新軍中最早只有同盟會員四人，分別爲一標二營後隊隊官張作棟、一標二營左隊隊官彭世安、一標二營左隊司務長張光奎、炮營左隊隊官朱彝銘。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陝省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一十二名學生畢業回陝，按所學兵科分發各營隊充任初級軍官，其中一標二營督隊官錢鼎（定二）、騎兵營右隊官曹位康、炮兵營中隊隊長黨自新、炮兵營右隊排長張鈞（伯英），和炮兵營中隊長張保麟爲同盟會員。錢鼎、張鈞原在學校時，即與山西張培梅、湖南劉建藩、浙江呂公望、裘紹等人組織軍學會。兩人來到陝西後，便設立「軍事研究社」。同年春，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張鳳翽，被委任爲新軍督練公所委員，後升任新軍第二十九混成協司令部參軍，又改任參謀兼一標一營管帶。張鳳翽雖未加入同盟會，卻和張鈞文往密切。新軍中的同盟會員雖然不多，不過哥老會卻勢力龐大，其重要人物有張雲山、劉世杰、萬炳南、吳世昌。而同盟會員錢鼎本身也是哥老會的哥哥弟，透過錢鼎的支持與連絡，新軍中的哥老會和社會上的同盟會員，如井勿幕、郭希仁、胡景翼等，開始建立關係。（註三八）宣統二年六月三日，同盟會黨人與哥老會領袖秘密開會於省城南郊小雁塔，共三十六人，號三十六弟兄，歃血爲盟，共圖大舉。（註三九）錢鼎、黨自新、張鈞等又在西安創設武學研究社，名義上是軍事學術研究機構，實際上是一秘密革命據點，新軍中的同盟會員在此聚會，並向當地陸軍中、小學學生發展會員，傳播革命思想。（註四〇）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員、會黨及新軍彼此已有連繫。除公益書局、健本學堂、武學研究社之外，陝西尚有下列幾個革命黨人聚會處所：

- (1) 西安馬家存心堂書舖，推銷革命刊物。
- (2) 三原勤公社，運銷新書。
- (3) 西安公正紙店，為井窩家庭開設販運紙張的老店號。
- (4) 西安麗澤館，一九〇八年郭希仁、賀紱之籌設，舉辦演講，宣傳新知識，開通民智，發刊「麗澤隨筆」。
- (5) 西安聲鐸社，一九〇九年郭希仁、王鎔丹等設，與麗澤館類似。
- (6) 西安西嶽廟女子學堂，一九〇二年由南雪亭、王瑞軒、李授洲、孫伯衡、王若泉等發起並負擔經費，鄒子良主辦，該學堂提倡婦女識字、放足、培育女青年。
- (7) 大荔同州中學堂，有同盟會員尚天德、寇勝浮在該學堂任教。

此外，陝省還有幾份同情革命的刊物，不僅發揮了啓迪民智的作用，並宣傳反清思想：

- (1) 「興平報」，一九〇九年興平知縣張瑞璣和士紳張淵共同創辦，社長南風薰和郭希仁有密切聯繫，該報原在興平，每十日出刊一張，後遷往西安，改為「興平星期報」。
- (2) 「帝州報」，一九一〇年由「興平星期報」及「普及白話報」改辦，於西安發行。
- (3) 「麗澤隨筆」，一九一〇年由西安麗澤館發行，每月朔望各出版一冊。
- (4) 「聲鐸公社質言」，一九一〇年在西安由郭希仁、王鎔丹等出版。
- (5) 啟社學校，一九一一年春在西安由郭希仁、張瑞璣等創辦。（註四一）

會黨和新軍均係同盟會員所運動，而傾向革命。但清末各省的諮詢局及各地教育機構，多數是由立憲派和地方士紳所掌握，陝西則反是。陝省同盟會員本有不少服務於教育界，如前述之西安女子學堂，健本學堂和同州中學堂。一九〇

八年陝西省教育會成立，各縣紛紛成立教育分會，同盟會員乃趁機加入，利用其爲合法組織。如同盟會陝西東路支部長常銘卿和會員陳熙爲蒲城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習，蒲城縣教育分會成立，經過革命黨人的活動，常銘卿被選爲會長，副會長爲楊鵠銘，演講員寇孝庭，李雅軒、常仙洲、劉芳初，書記雷電，勸學員李九標，評議員井岳秀、劉荃生，原振之等，均爲同盟會員。（註四二）至於一九〇九年成立的陝省諮詢局，副議長郭希仁即在同年由陳會亭、景梅九介紹入同盟會，（註四三）且積極參與陝省同盟會的活動。另一副議長李桐軒及議員柏筱餘、井嵩生，也爲同盟會員。（註四四）辛亥革命前同盟會員與地方士紳關係密切，利用公開和秘密的方式，推動革命，立憲派在陝省自然無從發生作用。

陝西的舉義行動於宣統三年九月一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爆發於西安，距武昌首義不過十日，爲各省最先響應者。是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同盟會總部決定於農曆八、九月間在全國各地同時起義，西安之起義時間定在八月十五日。至陰曆八月間，西安已傳出八月十五日陝西黨人將舉事，清吏搜捕甚緊，且對新軍已起疑心，遂改定由井勿幕、胡景翼率刀客在渭北發難，錢鼎等人策動新軍在西安響應。武昌起義爆發後，陝西當局密謀把新軍調離西安，再逮捕其中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本預定農曆八月九日舉事，乃因此決定提前發動，推張鳳翽爲首領。省城起事尚稱順利，初一即佔領軍裝局，取得武器彈藥，並控制陸軍中學堂。初二猛攻滿城，雙方死傷慘重。同日張鳳翽以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名義布告安民，文曰：「各省起義，驅逐滿人，上應天命，下順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漢回人等，一視同仁，將此曉諭，其各放心。」初三攻克滿城，西安將軍文瑞自盡，革命軍陸續搜獲護理巡撫布政使錢能訓，勸業道光昭，提法使錫桐，提學使余塈。光昭及錫桐均捐款自贖，余塈則遣回原籍四川。（註四五）由於陝省哥老會勢力龐大，且已與同盟會合作，西安舉義後，各地反正者多係哥老會或軍隊中之哥老會發動。（註四六）而在陝西省城，卻因起義領袖之爭功，引發哥老會與同盟會之間衝突。九月初四日起義領袖聚會於軍裝局，衆人雖一致推舉張鳳翽爲大統領，然副統領一職，卻因推舉錢鼎或哥老會首領萬炳南，引起爭執。五日在督練公所再度集會

#### 四、武昌起義後陝甘的回應

常銘卿和會員陳熙爲蒲城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習，蒲城縣教育分會成立，經過革命黨人的活動，常銘卿被選爲會長，副會長爲楊鵠銘，演講員寇孝庭，李雅軒、常仙洲、劉芳初，書記雷電，勸學員李九標，評議員井岳秀、劉荃生，原振之等，均爲同盟會員。（註四二）至於一九〇九年成立的陝省諮詢局，副議長郭希仁即在同年由陳會亭、景梅九介紹入同盟會，（註四三）且積極參與陝省同盟會的活動。另一副議長李桐軒及議員柏筱餘、井嵩生，也爲同盟會員。（註四四）辛亥革命前同盟會員與地方士紳關係密切，利用公開和秘密的方式，推動革命，立憲派在陝省自然無從發生作用。

時，萬炳南執意要任大統領，哥老會的陳同甚至表示實力已由哥老會掌握，自然應以萬炳南為大統領。後經郭希仁分向哥老會陳殿卿、張雲山、馬玉貴等人說服，彼等終於願和衷共濟。初六日集會時，萬炳南見人心向背，氣焰也有所收斂，不過此時張雲山也對自身之地位未作安排感到不滿，在其住所高等審判廳揭起「洪漢」旗幟，隱然與張鳳翹相抗。其後經數度集會，終於完成了如下的權力分配：

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鳳翹	副大統領：錢鼎、萬炳南
兵馬大都督：張雲山	副都督：吳世昌
糧餉大都督：馬玉貴	副都督：馬福祥
軍令大都督：劉世杰	副都督：郭勝清
東路征討大都督：張鈞	副都督：郭金鏞
西路征討右翼大都督：萬炳南	副都督：吳世昌
西路征討左翼大都督：張雲山	

上述職位可說因人設官，主要在於安撫哥老會首領，而哥老會方面也就此形成四個勢力：萬炳南、張雲山、馬玉貴、劉世杰，彼此互相監督，互相牽制，卻對軍政府的統治起了安定的作用。省城人事雖已安定，但省內各城哥老會卻氣焰高張，遍設碼頭，派款勒捐，甚至招兵買馬，另組軍隊，一時之間會黨土匪不分，為害地方甚大。軍政府得知情況後，一面要求各府廳州縣倡辦民團，一面決定選派大員前往安撫，當即仿照過去安撫招討使的制度。分為東南西北四路，各派一人。東路因錢鼎已先期前往，未再另派，北路宣慰安撫招討使井勿幕，南路宣慰安撫招討使張寶麟，西路宣慰安撫招討使曹位庚。但西路不久即淪為戰區，曹位庚無法行使職權。直到十月甘軍竊伺鳳翔時，才由副大統領萬炳南前往坐鎮。（註四七）

陝西省政府臨時機關，原為九月初三組織的秦隴復漢軍總司令部，下設參謀、文書、軍需三部，和民政府等機構。總司令部設於軍裝局，九月初七遷至高等學堂，改設軍令、民政兩府，和參謀、軍需兩處。其後因情況逐漸穩定，加以

事務日漸增多，於是另行調整，把軍令、民政兩府同時撤銷，設總務府總攬一切，發佈文告概用大統領名義。又分設軍政、民政、財政、司法、教育、外交、交通、實業八部。十月初一日，軍政府遷至北院，南京政府於同時頒發「中華民國軍政府奉省都督印」。袁世凱任總統後，下令地方不得用「部」的名稱，逐將八部改為八司。民國元年七月，「各省都督府組織條例」公佈，不久陝省即按照編制，成立都督府。

辛亥革命期間，陝省戰事主要集中在東路和西路。東路方面，陝軍與清軍曾三度爭奪潼關，後因南北和議達成，清帝退位。陝軍東都督張鍊亦與河南教軍司令趙倜及第六鎮協統周符麟議和。(註四八)

陝西省西路之戰事，則與甘省的壓制革命有關。甘肅由於地位偏僻，且省內無革命黨人活動，無法及早得知外省革命情形及武昌起義的音信。西安起義後，前陝甘總督升允即由西安逃奔甘肅平涼，聲明勤王。陝甘總督長庚電奏清廷，保薦升允充任陝西巡撫，督辦陝西軍務，清廷從之。同時長庚也奉命積極佈署軍事，準備援助陝西清軍。並把甘省軍事參議局改為總營務處，調軍事參議官黃鍊坐鎮秦州，又把甘省陸軍混成協改編為防營。升允攻陝分為兩路，升允擔任北路，由涇州東進，謀取長武。節制調遣馬安良、陸洪濤、馬國仁等部共二十二營；陝甘提督張志行擔任南路，由隴南東進，奪取隴州。自十月初一起，北路升允連下長武、邠州、永壽、三水，至十二月初，與陝軍張雲山相持於乾州。升允命馬安良續攻陝西，又令陸洪濤率所部進攻醴泉、咸陽，雙方爭奪激烈。南路張行志所率甘軍攻克隴州、汧陽、岐山，並全力攻克鳳翔。而在此時，清帝已宣佈退位，張雲山將此消息告知馬安良，馬安良遂無意再戰，與陝軍簽訂停戰協後，將其部隊撤回涇州。升允知大勢已去，遂於一月二十三日退走，張行志則於二十六日率所部自原路退回甘境，並令副將唯正午同日退出陝境，甘軍歷時三月之攻陝行動終告結束。(註四九)

升允率甘軍攻陝時，甘省境內也爆發若干反抗滿清的事件，如辛亥年九月哥老會劉華堂、劉曜鯉等藉革命軍名義，攻陷寧夏，十月哥老會首領王良慶謀起義，然不旋踵即被撲滅。十二月炮隊管帶擬趁除夕辭歲禮，帶隊入城誅長庚，宣告獨立；後聞清帝宣佈退位，遂未實行。(註五〇)然清帝退位，長庚依然未允共和，對於清廷之遜位詔秘而未宣。是時宗社黨有意退保潼關以西，據地頑抗，甘紳亦有與之唱和者。(註五一)民國元年三月六日，代理甘肅布政使趙惟熙

和諮詢局局長張林焱領銜，代表甘省官紳致電袁世凱承認共和，然在省內並未對外宣布。至長庚公布清廷退位詔後，甘省諮詢局繼而改組為臨時省議會，舉李鏡清為議長。袁世凱原屬意長庚任甘肅都督，長庚拒絕，甘省乃推趙惟熙為代都督，長庚去職。（註五一）三月十五日，袁世凱任命趙惟熙署甘肅都督。

駐守秦州的黃鍼原本傾向革命，因勢單力薄，初時雖聞他省相繼舉義，卻不敢輕舉妄動。後見甘省發兵攻陝，乃決定響應革命，藉以牽制甘軍，於三月十一日在秦州宣布獨立，成立隴右軍政府，並稱蘭州若實行共和，即取消獨立名號。但黃鍼見蘭州宣布共和後，「滿印不換，滿制不改，翎頂衣冠，悉如其舊，腐敗專制，更甚於前。」（註五二）因此並未取消獨立，一時之間，甘肅存在兩個政權，趙惟熙堅持秦州獨立在省城承認共和之後，故而嚴責黃鍼，復遣吳炳鑑率兵赴秦州，欲以武力解決。黃鍼亦獲四川支持，不惜一戰。後經秦州正紳張世英再四調停，至六月七日，黃鍼終於取消獨立，甘省復歸統一。

## 五、結論

辛亥革命的爆發，是近代中國史上極重要的事件。我們若仔細探究，可以發現清廷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面對外力的衝擊，不得不進行若干改革，但其改革步驟過於緩慢，廣度亦不足，遂使有識之士感到不滿。清廷的改革努力雖無太大成效，卻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促使他們選擇革命的方法，俾為中國人民爭取更多的福祉。

陝西與甘肅雖為比鄰省分，但在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陝省的經濟情況較甘省為優，學風亦頗興盛，故在清末的變局中，能夠及時產生回應。甘省地處偏僻，對於變局的認識遲緩；再加上陝甘總督升允的延宕新政，所以在清末，甘肅依然處於封閉狀態，革命勢力也因此缺乏一個較為適宜的發展環境。是故陝西革命黨人數衆多，能於武昌起義後立即響應。甘肅反而成為反擊革命的重要根據地，後因大勢所趨，方才擁護共和。

陝省的三大革命勢力中，雖以同盟會員為主導力量，但真正具有實力的是會黨與新軍。辛亥革命後，會黨與新軍分庭抗禮，而哥老會分子於革命爆發後，在各地趁亂騷擾，引起地方民衆的恐懼，新軍遂負起平亂的責任，進而逐步掌握

了辛亥以後的政局。然而陝西新軍中的同盟會員，只有少數具有明確的革命意識，迨至袁世凱當權後，陝省的軍政大權遂不能免於北洋軍系的控制。民國七年，陝籍革命黨人井勿幕、子右任等，一度組織靖國軍，響應南方之護法運動。但井勿幕英年早逝，子右任等人艱苦支撑，亦無法再度開創局面。甘省的革命勢力本就十分微弱，革命黨人無從影響當地政局。因此陝甘兩省在民初時期，大抵受制於北洋軍系。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後，情勢才有所變化。

## 註釋

- 註一：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二一，頁三三三。
- 註二：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七，頁三九。
- 註三：宣統重修涇陽縣志，卷十二，頁十五。
- 註四：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一八四〇—一九一九（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頁八二二五。
- 註五：諭摺彙存，光緒廿八年五月廿三日，頁三三。
- 註六：張汝梅、趙維熙，「陝西創設格致實學書院摺」，皇朝經世文新編，五上，頁九乙。
- 註七：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一八六〇年—一九一六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初版），頁一七四—一五。
- 註八：魏光蘊，「請設游藝學塾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七，頁三四。
- 註九：炎培，「清季各省興學史」，人文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民國十九年九月），頁二一。
- 註十：炎培，「清季各省興學史」，頁二一三。
- 註十一：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八五—六。郭厚安、吳廷楨主編，悠久的甘肅歷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二二二—一五。
- 註十二：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上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六月二版），頁三三三—一三。
- 註十三：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年四月初版），頁二〇七—一四。
- 註十四：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上冊，頁三〇九—三。
- 註十五：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八年十月），頁二二二—一三。
- 註十六：王樹槐，庚子賠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初版），頁一五一。
- 註十七：轉引自民國續修陝西省通志稿，卷一七九，紀事十三，頁二十一。
- 註十八：佚名，「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三，收於王獨清輯，庚子國變記（上海，神州國光社，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頁一八六。
- 註十九：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〇年）頁三六二。
- 註二十：李定一，中華史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八月），頁六六〇。

- 註二十一·民國安塞縣志，卷一八，藝文，頁八乙。
- 註二十二·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第〇一四三八三號。
- 註二十三·宣統政記實錄，卷十三，頁十六十七。
- 註二十四·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合十版），頁一八〇。
- 註二十五·根據現存之各種革命組織名錄中，並無甘籍會員之記載，但若干資料曾提及甘籍革命黨人。如閻鑄九在「洪幫在甘肅的活動」一文中收於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一九八一年出版），指出甘籍興中會會員喬壽山於宣統元年來到甘肅，宣傳革命和聯絡幫會起義，並吸收洪幫王沐震加入興中會（頁五二一三）。慕壽祺在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二六中，指出黃鐵爲「同盟會中人也」（頁四四）。這些人是否真爲興中會或同盟會正式會員，仍有待繼續考證。
- 註二十六·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四年一月出版），頁六七九。
- 註二十七·于右任先生譜（台北，國史館，民國六七年四月出版），頁八二一。
- 註二十八·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革命文獻，第二輯（中國國民党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四十二年七月），頁七。
- 註二十九·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二四。根據這份名冊，井勿幕加盟時間爲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六月四日，但另有其他資料指出，井氏是在一九〇五年夏加盟。見張應超，「井勿幕」，宗志文、朱信泉主編，李新校閱，民國人物傳，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八月），頁八〇。
- 註三十·本會辛亥革命史料組調查整理，「陝西辛亥前革命思想傳播和同盟會的初期活動」，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一版），頁二九二。是時加入同盟會較重要者有西安的王子端、焦子靜、李仲特、李桐軒，三原宏道學堂教師謝鏞，同州師範學堂教師李某。另見張應超，「井勿幕」，頁八〇）。
- 註三一·入會者有宋元愷、曹澍、白秋陔、席豐、寇鴻恩、張阜生、張熾章、楊銘源、陳之頤、徐應庚、張慶豫、李魯吾、張丙昌、茹欲進、張宗福、南兆豐、鄒炎、馬師表、謝增華、馬浚甫、高耆卿、張蔚森、景志傳、張翊初、李天佐、由煥章、于伯行、田種玉等公私費留學生，以及高幼尼、徐志鴻等來東京考察的士紳。見趙其襄、高又明遺稿，「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動的片斷」，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一六五六六。
- 註三二·「陝西辛亥前革命思想傳播和同盟會的初期活動」，頁一八七九〇。
- 註三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民國五十三年元月），頁四〇〇。

註三四：又有稱健本學堂為鄒子良、師子敬、焦子靜、曹寅侯等人創辦於西安富平會館。見革命文獻第六十六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民國六二年六月出版），頁一三三。另見馬彥、師子敬，「焦子敬的革命活動」，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一八六一七。

註三五：「辛亥革命前思想傳播和同盟會的初期活動」，頁二一九六一八。刀客原是指關中渭河兩岸地區一批經常攜帶「關山刀子」的特殊人物，這種刀子是臨潼縣屬的關山鎮製造的，長約三市尺，寬不到二寸，形制特別，可用作自衛武器，亦可用來報仇搏鬥。到了光宣時期，有些刀客也置長短槍支。刀客只有大大小小集團，並無嚴整的紀律與組織，早先販賣私鹽、私茶或為商家保鑣，且性喜打抱不平，拔刀相助。見「關山刀客」，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二六七一九。

註三六：趙西山，「關中革命運動概略史」，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輯第三冊，頁四一。

註三七：「辛亥革命前思想傳播和同盟會的初期活動」，頁二一九七一三〇一。

註三八：朱叙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二〇一三一。蔡屏藩編述，陝西革命紀要（民國五一年四月出版），頁六。楊子廉，「我所知道的錢定三」，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一七六一七七。「陝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會」，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二六〇一。張應超，「張鳳鸞」，中華民國史人物傳記，頁六二。張鳳鸞是否曾加入同盟會，仍待求證。據馬凌甫回憶說，他曾勸張鳳鸞加入同盟會，而張表示他在求學日本時，於同盟會成立之即率先加入，但因黃克強曾譖軍人同盟會員不宜隨便表明身份，是故自己不曾說過。見馬凌甫，「回憶辛亥革命」，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九一。

註三九：革命文獻，第六十六輯，頁一三八。一說參與結盟者不只三十六人，哥老會習慣以三十六這個數字作為吉祥數字，符合三十六「天罡」的意見。見「陝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會」，頁二六一。

註四〇：「陝西辛亥前革命思想傳播和同盟會的初期活動」，頁二一九三。

註四一：同註四〇，頁二一九五一三〇三。

註四二：由於蒲城縣立高小學生容易受到革命的宣傳鼓動，造成學生、教育分會和官府的衝突，釀成規模甚大的「蒲案」，迫使蒲城知縣李體仁去職。見辛亥革命史料組調查整理，「一九〇八年陝西蒲案始末」，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頁二四八一五七。

註四三：郭希仁，「從戎紀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七五。

註四四：「陝西辛亥革命思想傳播和同盟會的初期活動」，頁二九四。

註四五：朱叙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頁三五一四二。

註四六：郭希仁，「從戎紀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七六。

註四七：朱叙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頁四三一八。

- 註四八·張鈞，「潼關戰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三冊，頁七頁，一六七。
- 註四九·朱叙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頁六六一八二。
- 註五〇·慕壽祺輯註，甘寧青史略正編，（台北，廣文書局影印出版），卷二七，頁四三一五二。
- 註五一·黃，「隴右光復記」，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五冊，頁四五一。
- 註五二·慕壽祺輯註，甘寧青史略正編，卷廿七，頁四。另見趙艷林，「辛亥烽火」，郭厚安、吳廷楨主編，悠久的甘肅歷史，頁一六一。
- 註五三·「川軍援甘通電」，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四九一九二。

